

#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 的现代价值

曹德本 主编

王华巍 田伟 副主编



清华大学亚洲研究中心2005年度一般资助项目  
清华大学科学发展观理论与实践研究基地项目

#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价值

曹德本 主编

王华巍 田伟 副主编

参著者：李蕉 方妍 王玉华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 内 容 简 介

本书以“中国传统天人文化与天人和谐”、“中国传统义利文化与见利思义”、“中国传统和谐文化与和谐社会”、“中国传统德治文化与以德治国”、“中国传统民本文化与以人为本”、“中国传统修身文化与道德建设”、“中国传统廉政文化与为政之德”、“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社会稳定”等八个章节阐发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价值，体现了当代本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具有前瞻性。本书适合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人员与教学人员阅读。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501256678 13801310933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价值 / 曹德本主编.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8

ISBN 7-302-13447-2

I. 中… II. 曹… III. 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国 IV. D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80912 号

出 版 者：清华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

<http://www.tup.com.cn>

邮 编：100084

社 总 机：010-62770175

客户服务：010-62776969

组稿编辑：李家强

文稿编辑：杨爱臣

印 装 者：三河市春园印刷有限公司

发 行 者：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140×203 印张：6.125 字数：120 千字

版 次：2006 年 8 月第 1 版 200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302-13447-2/D · 221

定 价：38.00 元

# 目 录

<b>导 论 关于研究方法论的宏观思考 .....</b>	<b>1</b>
一、思想体系与文化底蕴相结合 .....	1
二、弘扬超越与借鉴融合相结合 .....	9
三、传统分析与现代价值相结合 .....	13
四、学问立言与修身立人相结合 .....	16
<b>第一章 中国传统天人文化与天人和谐 .....</b>	<b>18</b>
一、天命观形态下的天人合一 .....	19
二、天道观形态下的天人合一 .....	21
三、天理观形态下的天人合一 .....	24
<b>第二章 中国传统义利文化与见利思义 .....</b>	<b>29</b>
一、“人非利不生” .....	30
二、“制礼义以分之” .....	33
三、“见利思义” .....	34
四、“计利富民” .....	39

<b>第三章 中国传统和谐文化与和谐社会</b>	44
一、“太和所谓道”	45
二、“以他平他谓之和”	46
三、“发而皆中节谓之和”	48
四、中国传统和谐文化的现代价值	48
<b>第四章 中国传统德治文化与以德治国</b>	53
一、中国传统德治文化的哲学基础是天人合一	55
二、中国传统德治文化的伦理准则 是义利统一	60
三、中国传统德治文化的关键环节是贤者治国	64
四、中国传统德治文化的核心内容是以民为本	67
五、中国传统德治文化的理想追求是三大和谐	71
<b>第五章 中国传统民本文化与以人为本</b>	75
一、民本文化的理论基础	76
二、民本文化的核心内容	78
三、民本文化的现代价值	84
<b>第六章 中国传统修身文化与道德建设</b>	91
一、修身以人性理论为思想基础	92
二、修身以道德自律为基本模式	97
三、修身以精神境界为理想追求	105
<b>第七章 中国传统廉政文化与为政之德</b>	112
一、“为政者廉以洁己”	112

二、“为政者慈以爱民” .....	115
三、“为政之要惟在得人” .....	119
<b>第八章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社会稳定</b> .....	<b>123</b>
一、社会稳定的文化定位 .....	124
二、中国特点的社会稳定 .....	126
三、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社会稳定 .....	131
<b>附一 中国传统文化学方法论</b> .....	<b>138</b>
一、中国传统文化学的学科定位 .....	138
二、中国传统文化学的思想体系 .....	143
三、中国传统文化学的治学精神 .....	149
<b>附二 全球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学</b> .....	<b>154</b>
<b>附三 中国传统文化学的学术创新</b> .....	<b>176</b>
一、中国传统文化学的世纪变革 .....	176
二、中国传统文化学的价值转换 .....	180
三、中国传统文化学的学术创新 .....	182

## 导论

# 关于研究方法论的宏观思考

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价值研究中,关于研究方法论的宏观思考,主要突出四个结合:一是思想体系与文化底蕴相结合;二是弘扬超越与借鉴融合相结合;三是传统分析与现代价值相结合;四是学问立言与修身立人相结合。

## 一、思想体系与文化底蕴相结合

文化底蕴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支柱,失去文化底蕴的民族就像无根的浮萍,是很难在世纪变革的大潮中立足的。中华民族是具有雄厚文化底蕴的民族,正是依靠这种雄厚的文化底蕴,我们走过了几千年的艰苦卓绝的发展历程,应对了各种历史性的挑战。在面向未来的道路上,中华民族不能没有精神支柱,不能没有理想信念和追求,只有充实中华民族文化底蕴,才能在文化融合的大潮中底气充足。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思想体系是以坚实的文化底蕴为根基的,把握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思想体系,必须与民族的文化

底蕴相结合，只有这样，思想体系的研究才不是历史思想的简单堆积，而是民族文化底蕴的深层次积淀。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思想体系是以深层次的民族文化底蕴为内涵的，这个思想体系概括为：以天人合一为哲学基础，实现修身、治国、平天下。

### （一）天人合一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思想体系是有坚实的理论基础的，有一个从哲学的高度立论的理论基石，这就是中国传统的天人之辨，它的表现形式主要是自然天道观。在中国古代，自然天道观不是孤立地讲天道，而是与人道相联系的。人道是指人世间的人事之道，讲天道是为人道寻求理论根据，从而为人道服从天道进行哲学论证。这就是所谓的“究天人之际”（《汉书·司马迁传》），即从哲学的高度探究天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就是研究天人合一的道理。

天道观是春秋时期比较流行的思想，“天道盈而不溢”，“天道皇皇，日月以为常”（《国语·越语下》）。“礼以顺天，天之道也。”（《左传·文公十五年》）“忠信笃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左传·襄公二十二年》）“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左传·昭公十八年》）在春秋时期，天道多指天象变化，并含有推算人的吉凶祸福的迷信成分。后来的自然天道观，其含义既指神秘的必然性，又指客观规律和法则。在不同的思想家中，其含义虽然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他们都认为天道与人道相联系。《周易》阐发了天道与人道的统一：“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

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周易·说卦》）“天人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周易·恒·象》）王夫之的天道观主张天人合一，他说：“天下之势，一离一合，一治一乱而已。……一合而一离，一治而一乱，于此可以知天道焉，于此可以知人治焉。”（《通读鉴论》卷十七）王夫之认为，天与人合而为一，人道不违天道，政事上的成败得失必须遵循自然规律。中国古代的自然天道观，不是孤立地讲天道，而是与人道联系在一起的。讲天道是为了论证人道的合理性，以天道为人道立定准则。

总之，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思想体系是以天人合一作为哲学基础的，也就是“究天人之际”，即从哲学的高度认识宇宙，从而为人世间的人事之道立定准则。

## （二）修身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所讲的修身，是指实现理想的人格和完美的道德境界，并与治国、平天下联系在一起，其内容包括一整套修身之道，以人性理论为基础，通过心性修养的方式，达到理想的精神境界。

首先，人性理论奠定了修身的理论基础。人性问题是一个历史悠久而又内容丰富的问题。“性”字在商周典籍中已经有过记载，但作为人性学说被思想家明确提出，还是在春秋时期。后来，历代思想家都把人性作为一个重要的问题加以论述，各自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和见解。人性理论主要探讨人性是什么，它的本质是什么，人性的源泉是什么，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人性的等级品次是怎样的，等等。

通过人性理论的阐发，目的是说明能否通过修养而达到理想的精神境界。历代思想家都关注人性问题，形成了内容丰富而深刻的人性理论，从而为修身奠定了理论基础。在中国古代，人性理论的内容特别丰富，并且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日益深化。在一个注重道德修养的国度里，这是一个突出而有特色的问题。人性理论之所以这样丰富，是因为中国古代所讲的修养就是指人性修养，是修身养性，人性理论是修养论的理论基础。先秦至汉代的人性善恶之争，说到到底是为后天的修养指出门径：或者是通过后天的修养保持先天的善性，或者是通过后天的修养改恶从善。汉唐时期的人性品级层次之分，也是为人们从低品次向高品次修养做论证的。到了宋元明清时期，无论是两种人性的理论，还是一种人性的理论，都是强调后天的修养，改变后天习染中不纯的一面，从而达到尽善尽美的地步。中国古代思想家注重人性理论的阐发，其目的是为后天修养奠定理论基础。

其次，修养理论阐发了修身的基本途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不是孤立地讲人性，讲人性是为了讲修养。人性理论主要解决人为什么要修身的问题，而修养理论则说明怎样修身的问题，是讲修身的方法和途径问题。修养理论主要回答和解决如何通过后天的修养，恢复和保持先天的善性，如何改恶从善。修养理论经过历代思想家的阐发，提出了一系列较为完善的修养方法。这些修养方法，一是通过后天修养恢复和保持先天的善性，二是内心修养与行为修养相结合，三是个人修养与封建伦理准则相结合。以人性理论为理论基础，以修养理论为途径，最终目标是实现理想

的道德境界。

最后,境界理论展现了修身的理想追求。境界理论是关于追求人生理想的精神境界的理论,它是以人性理论为基础,以修养理论为途径,最终目标是实现理想的道德境界。这种理论体系阐明:人性的本质是善的,或者可以为善,通过后天的修养恢复和保持先天的善性;或者改恶从善,从而实现理想的道德境界。境界理论主要回答和解决修养所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人生理想的道德境界是什么。这种理论向人们指明人生追求目标和努力方向,充分展现了修身的理想追求。境界理论阐明了修养的理想目标,向人们展现了修身的理想追求,使人们受到精神上的鼓舞,明确努力的方向。这种境界理论从总体上讲不是在追求物质欲望的满足中获取人生价值,而是在高远的理想信念中追求个人的精神境界的升华。

### (三) 治国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所讲的治国,是指实施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实现民心稳定,长治久安。它以义利统一作为治国的伦理准则,以贤者治国作为治国的关键环节,以民本文化作为治国的核心内容。

首先,义利统一是治国的伦理准则。在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物质不富足的古代社会,治国的第一要义是如何处理物质利益的问题。物质利益是社会生活的基础,也是人的生活第一需要,是一个时时需要面对的问题。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实质上关系到治国应遵循什么样伦理准则的问

题。正如荀子所讲：“富有天下，是人情之所同欲也，然则从人之欲，则势不能容，物不能赡也。故先王案为之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贵贱之等，长幼之差，知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宜，然后使悫禄多少厚薄之称，是夫群居和一之道也。”（《荀子·荣辱》）义利之辨讲的就是如何处理义与利的关系，义利之辨是与治国相联系的，是从治国的伦理准则角度进行论证的。有的思想家重义轻利，有的思想家主张义利双行，以义导利，先义后利，但基本思想倾向则是认为义利统一，二者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不能离义而言利，也不能离利而讲义。他们基本上都承认人的欲望、物质利益的合理地位主张在以农为主的国情中，在物质水平低下的时代，应以道义引导民众的利欲之心。义利统一思想作为确立道义与利益关系的原则，它引导人们在物质利益面前以道义为重，使治国有一个可以遵循的伦理准则。抓住了这个问题，也就抓住了治国的根本问题。难怪义利之辨在中国古代从无间断，义利统一思想是很有价值的思想，实为治国的伦理准则。

其次，贤者治国是治国的关键环节。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很注重治国者的素质，认为治国者的素质是为治国的关键环节，关系到国家的兴衰成败。这个关键环节可以概括为贤者治国。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注重君臣的自身修养，提倡为君者要有君道，为臣者要有臣道，对官吏的选拔、任用和处罚应遵循一定的准则，从而形成吏治之道和用人之道。其中心思想是讲贤者治国，任贤选能，让贤者在位，能者在职，认为这是治国的关键环节。为了治国安邦的需要，历代

思想家和有作为的统治者大都提倡加强君臣自身修养，倡导任贤选能，让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历史的经验表明，如果违背了贤者治国的原则，君主荒淫无度，奸臣当道，就谈不上真正的治国。贤者治国是治国的关键环节。

另外，民本文化是治国的核心内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讲治国有一个核心内容，就是以民为本，治国的核心就是理顺民心，从而形成了内容丰富的民本文化。民本文化是以民为本的文化，中心思想是讲国以民为本，以安民为务，治国应以爱民、重民、宽民、足民、富民为基本方略。这种占有重要地位的民本文化，是治国的核心内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认为，治理国家要注重民心问题，认为民心向背关系到社稷的安危，关系到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把调整与民的关系作为治国的核心。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讲治国，说到底是通过对民的治理，实现社会的稳定，从而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这是由中国这种人口众、民族多的特殊国情所决定的。如果民心不稳，民众生活得不到保障，整个社会就不会得到综合治理。人民安居乐业，民心稳定，群体和谐有序，这本身就是一种具有文化意蕴的政治行为。中国古代讲“阴阳大化”，“大而化之”，并从自然之化引发出社会的政治教化，政治教化则是以文化为底蕴的，“政之为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卷一》）。这样，以民为本的思想构建了民本文化的基本框架，成为治国的核心内容。

#### （四）平天下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所讲的平天下，是修身、治国、平天

下整个链条的最终目标环节，是整个思想体系的最高层次，也是修身、治国所要实现的最高理想。这个理想目标就是追求天下为公。中国古代有“天下”一说，伪古文尚书的《大禹谟》中讲：“奄有四海，为天下君。”钱穆认为：“在古代的中国人，一般感觉上，他们对于中国这一块大地，并不认为是一个国，而认为它已可称为‘天下’，就已是整个世界了。中国人所谓‘天下’，乃一大同的。”（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附录《中国文化传统之演进》，商务印书馆 1998 年版，第 237 页。）中国古代由于科技发展水平的局限以及世界各国沟通交往的限制，对整个世界还没有一个整体的概念，不可能有一个科学的把握，只是笼统地意识到天下与国家不是一回事，天下是大于国家的，李塨讲：“盖天下者，国之积也。”（《大学辨业·题解》）在中国古代，从狭义上讲，“天下”是指天子统治的权位，从广义上讲，“天下”指普天之下的一切国家。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所讲的“天下”，就是指普天之下的一切国家，也就是原始意义上的“整个世界”。梁启超讲：“中国则于修身齐家治国之外，又以平天下为一大问题。如孔学之大同太平，墨学之禁攻寝兵，老学之抱一为式，邹衍之始终五德，大抵向此问题而试研究也。虽其所谓天下者非真天下，而其理想固以全世界为鹄也。”（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第三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讲平天下，就是为了追求天下为公，这是世界大同的理想目标，是天下之大公的人类理想社会。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思想体系形成了中心价值系统，这就是从哲学的高度认识自然，以伦理准则规范人生，最后

的落脚点则是治国平天下，这是充满文化底蕴的思想体系。

## 二、弘扬超越与借鉴融合相结合

中国进入近代社会以后，被迫打开了封闭的国门，也被动地遭遇了西方文化的冲击。在当时，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问题是一个突出的问题，出现了所谓中西体用之争，以及延续到 20 世纪 30 年代的文化论争，其中既有全盘西化论，也有传统复兴论。这时明显暴露出思维范式的局限，即中西关系的局限。这种局限就是两极绝对化思维，把丰富多彩的文化问题归为中西对立的两极，习惯于非此即彼的两极绝对化思维。对西方文化讲排斥就是绝对的排斥，讲吸收就是绝对的吸收，不是用中国文化否定西方文化，就是用西方文化否定中国文化，缺乏辩证分析。近代社会，由于文化准备不足，对中国传统的东西没有来得及系统清理，结果出现了两个极端，不是主张全面复兴传统，就是主张激进反对传统。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进入新的历史时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西方文化也大量进入。在西方文化冲击下，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问题继续成为当时的中心议题。有人主张，中国传统文化是封建性的东西，要实现现代化必须抛弃它，从而主张西化。而一些新儒家则主张在当代复兴儒学。这时的思维范式仍然没有摆脱两极绝对化倾向。由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缺乏系统清理，哪些是优秀的东西应当弘扬，哪些是封建的东西应当抛弃，都缺乏清醒的认识。这样，社会上出现的东西往往正是

需要抛弃的封建性的东西，而属于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则往往丢掉了。另外，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矛盾也缺乏清醒认识，出现了两种不良倾向：一是盲目排外的情绪掩盖了理性的思考，结果，狭隘民族主义作怪，失去了许多可资借鉴的东西；二是盲目崇拜西方的心态掩盖了辩证的分析，结果，民族虚无主义抬头，滋长了崇洋媚外的倾向。进入 21 世纪的新的历史时期，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世界大舞台上各民族文化相互交融与碰撞，出现了世界多元文化融合化的总体趋势。时代向前发展，必然引发思维范式的变化，从两极绝对化思维转为在多元文化融合的视角下进行思维，是一种新型的文化大思路，按照这种思维范式，我们应主动参与世界文明进程，在世界多元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为世界文明做出更大的贡献。实现这一目标是一种主动行为，必须主动地面对世界多元文化，以宽阔的胸怀关注人家的长处，对那些适合于我，可以为我所用的东西应主动借鉴融合，把视角移向世界与未来，由守势变为攻势，由被动遭遇转为主动参与融合化的大潮中，从而向世界表明，中华民族不能被动遭遇外来文化的冲击，而应主动实现对外兼容。这里应该指出的是，兼容精神是强者的风范，是文明的象征，是进步的体现。

在 21 世纪新的历史条件下，必须在学术大思路上体现两个方面的结合，即弘扬超越中国传统文化与借鉴融合外国进步文化相结合。

所谓弘扬超越中国传统文化，是指对优秀传统的弘扬和对消极因素的清理，目的是不能让优秀的传统丢掉，也不

能让腐朽的东西流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弘扬超越，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一是继承性。弘扬就是不割断历史，就是将历史上的优秀传统继承下来，使之代代相传，发扬光大。弘扬是尊重历史、尊重民族文化传统的体现，它充分体现出民族文化的历史继承关系。二是选择性。我们知道，古希腊、古罗马的丰富哲学思想是与其典型的奴隶制度相适应的，近代欧洲发达的哲学思想是与其典型的资本主义制度相适应的。同样，内容丰富而悠久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与中国历史上典型的封建制度相适应的。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封建制度发展得相当充分而完善，具有典型性。而中国传统与之相适应也具有典型性，这种典型性就在于，优秀的文化传统与封建主义的历史局限形成了一个尖锐的对照。正因为这样，弘扬就不是全面复兴，而是对优秀传统的弘扬。哪些应当弘扬，哪些不应当弘扬，一定要有所选择，不能让封建腐朽的东西流行，也不能让优秀文化传统丢掉。三是时代性。弘扬不是原封不动地照搬，而是将传统中的优秀成果拿来，为新的时代所用，要结合时代特点，对优秀传统做一番改造创新，不能局限于传统的东西，一定要有所创新，有所发展，有所突破。弘扬不是最终目标，还必须超越。弘扬超越是一个整体性思维，是在辩证分析基础上的弘扬，在弘扬基础上的超越，超越历史的局限性，越出古代的圈子，实现时代的跨越。

所谓借鉴融合外国进步文化，指的是一种主动的行为。即在 21 世纪世界多元文化融合化的总体趋势下，应主动参与这种文化融合的进程。这种文化融合进程既不是西方文